

# 周邦肇作——陕西宝鸡出土商周青铜器精华

乔文杰

2017 年 9 月,由深圳博物馆联合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周原博物馆、扶风县博物馆、岐山县博物馆、渭滨区博物馆等多家陕西宝鸡文博机构共同举办的“周邦肇作——陕西宝鸡出土商周青铜器精华”展,在深圳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各类青铜文物 182 件/组,涵盖了自建国以来宝鸡地区历次重要的西周考古发现,诸如眉县杨家村窖藏、扶风五郡西村窖藏、石鼓山西周墓等近十几年来的新发现。本次展览将延续到 2017 年 12 月 12 日。

## 西周文明的重要组成

宝鸡古称陈仓,位于陕西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的西端,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青铜文化遗存极为丰富,被誉为“中国青铜器之乡”。从西汉时载入史册的“尸臣鼎”到晚清时出土的“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两千年来,宝鸡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新中国成立以来,宝鸡发现的青铜器更是令世人瞩目,诸如西周初年的重器何尊,岐山董家、扶风庄白、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都极大地震撼了世人并丰富了人们对西周历史的认知。2012 年以来,宝鸡石鼓山又相继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西周贵族墓葬,其中出土了不少罕见甚至是首次发现的青

铜珍品,被评为 201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青铜器作为西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主要载体。以周原为核心的整个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重器多、铭文多、器形种类多的特征,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此次深圳博物馆“周邦肇作”展览所展出的青铜器,造型奇特、纹饰华丽、工艺复杂、铭文丰富,代表了西周青铜文明的最高成就,为公众直观了解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礼仪制度、工艺铸造等各方面知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周邦肇作”一词来源于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周邦”指西周王朝,在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中,周人对自己的国家称为周邦。展览中的逯鼎就记述了周王称赞逯的先祖“有

爵于周邦”,意为对国家有贡献。“肇作”是当时铭文中的惯用词。通常铭文开头经常是“作器者某某为其先人‘肇作’某器物”,语含恭敬、庄重之意。“周邦肇作”中,“肇作”也可以谐音“造作”,大意为周人建立西周王朝后铸造的众多青铜器,用在展览标题中,特指本展中的青铜器。其中,一级文物就有 40 件,带铭文的青铜器也有 87 件。比较重要的器物有户方彝、户卣、伯各尊、伯各卣、卫簋、卫鼎、四十二年逯鼎、单父父方壶、南宫乎钟、秦公罇等。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宝鸡出土的青铜器,目的是向观众展示西周时期周人创造的礼乐文明与青铜艺术。所展青铜器类别涵盖了青铜容器(又细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青铜器种类。展厅呈长方形,面积 1200 m<sup>2</sup>,展线超

过 120 米,靠墙设置固定通柜,中央的控电设备间及消防通道将展厅一分为二,中间以一条通道连接。展览文物绝大部分都陈列在固定通柜内的展台上,另外特别精选 22 件/组重要展品以中心柜展示。

展览设计了两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一是围绕青铜器本身展开介绍青铜器礼器功能和装饰艺术;另一个是按照“透物见人”的原则,结合考古发现的场景和器物组合,介绍这些青铜器的主人——西周贵族和他们的历史。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依次为“周王朝的建立”、“周人的礼乐文明”、“周王与贵族”以及“西周的青铜艺术”。其中,一、三单元是结合重要考古发现,侧重于讲人与事,重在凸显展览中众多带铭文的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二、四单元则是以青铜器为中心,侧重于讲器与

礼,更多地展现青铜器的礼器组合功能和装饰艺术。这样的单元安排很好地平衡了展览的重心,如第一单元有 2012 年新发现的石鼓山三号西周墓,第三单元有 2003 年发现的眉县杨家村窖藏,这两次发现的青铜器无论是艺术观赏性还是历史价值都有吸引眼球、震撼人心的效果,保证了展览的开始和中间都有亮点。

## 周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 1046 年,武王伐纣,一举攻灭了殷商,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王朝,史称西周。伴随着周人的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周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地向四方延伸。为

(下转 14 版) ➡

➡ (上接 12 版)

佛教是佛教,道教是道教,地方上纪念的人物,各按其性质和事迹,各有各的寺庙。但在台湾,却是相当程度的混杂,一家寺庙,几乎没有例外,都会成为许多不同神明的共同奉祀之地。他以台北著名的万华龙山寺为例,诸位神祇,包括佛、道、儒三教皆在祭祀之列,神明众多,功能复杂。这充分体现了东方宗教的多神性,与西方的一神教传统迥然有别。

西方的宗教是一个神圣的世界,与世俗的现实世界构成严峻的对立与紧张。但中国的神圣与世俗这两个世界却没有严格的界限,神圣在世俗之中,世俗有神圣的庇护。许先生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无论佛、道,或其混合道教派,在近百年余年,均呈现淑世道趋向,亦即杨庆堃指陈的‘世俗化’,从理论的阐述,转化为虔敬与实践,由寻求出世的解脱转向入世的救助与扶掖世人。”这些年在台湾与大陆发展很快的星云法师所主持的佛光山与证严法师所主持的慈济会都具有“人间宗教”的性质,扶弱救贫,广布慈善,与西方一神

教注重个人的信仰、心灵的虔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西方的一神教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毫无影响。许先生指出,到了魏晋隋唐,中亚和内亚的各种一神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等都随着胡人的足迹进入中国,他们并没有为士大夫精英所接受,却沉淀在民间,为民间信仰所吸收,演化为中国的启示性宗教。宋代方腊的“吃菜事魔”教派、元明两代的白莲教、晚清的拜上帝会等等,都吸收了一神教的观念和仪式。这一个寄生于民间底层的信仰,其实从来没有中断,只是在各时代以不同的名称出现。中国的老百姓平时都是多神教信徒,到了揭竿而起之时,皆拜倒于一神教之下,膜拜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神与权威,足见中国的一神教并非是到了 20 世纪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其实在古代中国的民间信仰之中就有渊源可循。

最后是地缘。许先生在书中说:“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如果人类没有集体的组织,个别个人没有虎豹的爪牙,没有马和羊的奔跑速度,也没有大象、

犀牛的大体积,人不能上天,也不能入水,在这地球上,人类根本没有和其他生物竞争的能力,正因为人类可以合作,才终于主宰了这个地球,奴役了其他的生物。”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中国人除了宗法血缘之外,最注重的是乡缘。以乡土为中心,将各种不同的亲缘关系网络、混合类亲缘关系网络以及信缘关系编织为更庞大的地方组织,这是传统中国权力结构中很重要的一环。许先生指出:自古以来,中央的权力其实不大,真正的治理实体是在地方。日常事务的管理,其实不在县衙门,而是在民间。宋代以来形成的地方士绅,是地方的头面人物,也是民间秩序的治理主体。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之中提出一个理解中国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差序格局,许先生在书中对差序格局有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他说:差序格局的延伸,是从亲缘延伸到地缘,每一个人在这大网络之内,有所归属,依靠网络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凭借网络,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差序格局之中,个人既

有权利,也有义务;个人要自我约束,明白个人是社群的一部分。然而,个人也不是完全由社群支配。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得到某种重叠,这种个人到社群的延长线,是开展的,不是断裂的。个人对社群的尽力,与他从社群中得到的保障,互为因果,互相依附。许先生认为,中国传统之中的这一差序格局的特色,与今日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社会如今也出现了西方式的“原子化的个人”的现象,个人的孤独和社群的涣散成为当代社会之痛。而适当回归中国文化中的社群主义精神,可以救济个人主义的孤独,形塑一个既有个人自主性、又有社群向心力的健康社会。

许先生在美国工作与生活多年,深切感受西方文化的长处与不足;经常回国的他,又对海峡两岸的现代变迁有细致的了解,在书中,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深受以西方文化为主轴的现代文明影响,却

又依然置身在西方文化之外。今天,欧美现代文明本身,正在剧变的前夜。他们面临的问题,例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割:凡此危机,如果从西方文明的源头看,西方文明本身很难有解除这些困惑的资源。”他提出:“中国文化以人为主体的特性,以及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依附关系,也许可以当作他山之石,将中国常民文化的特色,融入现代文明之中,匡救现代文明的困难。”

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了“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大责任”,同样怀有家国天下情怀的许慎云先生,从人类未来发展的大视野中,看到了中国文化贡献于世界文明的可能性空间。中国文化的精神不是孤独的、抽象的理念,它存在于华夏历史的肌肤之中,浸润于亿万百姓的日常生活。只要民族不亡,生命永续,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将继续薪火流传下去,成为全人类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明之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